

# 新型全球城市假说： 理论内涵与特征事实

倪鹏飞 沈立

**摘要** 从全球化不同阶段内涵变动的逻辑出发，作者回顾了全球城市实践与理论的发展脉络，提炼出全球城市更一般的理论框架，然后依循理论和历史逻辑，提出新型全球城市假说。从理论视角和实证视角出发，作者深入分析了新型全球城市的形成及其特征，并从新的视角对其进行测度评价，得出如下结论：信息和金融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信息科技中心功能和金融中心功能的有机叠加成为新型全球城市的核心特征；新型全球城市可分为4个层级，其中，纽约、北京、伦敦、圣何塞属于顶尖新型全球城市。

**关键词** 新型全球城市 经济全球化 金融中心 信息科技中心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51X(2020)04-0028-15

## 一、问题提出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引发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突破，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升级，全球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这些变化相互叠加，汇聚成一股时代潮流。

首先，网络化、智能化时代正在到来。过去几十年，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与联合国人居署课题组合作项目“全球城市竞争力研究”（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多中心群网化中国城市新体系的决定机制研究”（批准号：71774170）。

【作者简介】倪鹏飞（1964-），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邮政编码：100028；沈立（1987-），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本文通讯作者，邮政编码：100045。

致谢：感谢审稿专家匿名评审，当然文责自负。

① 互联网世界统计（Internet World Stats）是一个国际性的互联网数据统计网站，其为全世界233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最新的世界互联网使用、人口统计、旅游统计和互联网市场调研数据等。

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进程持续深入，根据互联网世界统计（Internet World Stats）<sup>①</sup>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球互联网用户规模为41.56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54.4%（见图1）。在此背景下，信息科技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不断增强（沈立等，2018）。从电子商务到移动支付，从智慧出行到远程教育，信息化已经深刻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全新的数字世界正在成形，随之而来的是信息科技企业迅速成为领先品牌。根据英国品牌金融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sup>①</sup>发布的2020年全球最具价值品牌500强排名，亚马逊、谷歌、苹果位列前三，微软、脸谱、华为、三星等也跻身前十位，这些企业均为全球著名的信息科技企业。与2008年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影响力，信息科技企业都有了显著的提升。这也说明了信息科技已经成为推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未来，在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人类社会将进一步走向智能化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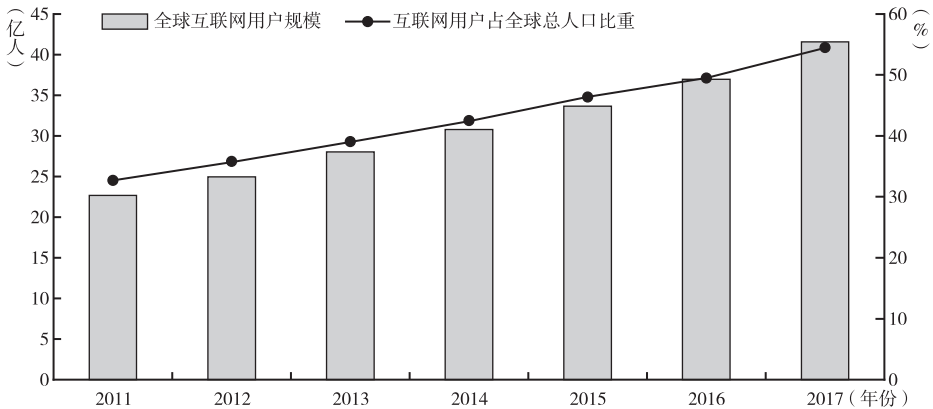


图1 2011—2017年全球互联网用户规模及其占全球总人口比重

资料来源：互联网世界统计。

其次，全球化进程在曲折中发展升级。受近年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影 响，经济全球化遭遇一定挫折，但是，全球化发展升级的趋势不会改变。目前，经济全球化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在贸易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产业全球化的基础上，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是商品贸易日趋萎缩。麦肯锡2019年发布的《转型中的全球化：贸易和供应链的未来》分析了43个国家的23条产业价值链，发现商品出口额占价值链产出总额的比例由2007年的28.1%下降到2017年的22.5%。二是服务贸易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速远超商品贸易，其中商业服务、专利授权、信息技术、旅游留学等领域更是出现井喷式增长。三是贸易区域化现象有所凸显。汽车、电

<sup>①</sup> 英国品牌金融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是全球性的独立第三方品牌价值评估和咨询机构，总部位于英国伦敦，每年定期推出《全球最具价值品牌500强榜单》，其评选维度通常包括公众熟悉程度、忠诚度、推广活动、营销投资、员工满意度、企业声誉等。

子产品等产业链正越来越集中于靠近消费需求的局部地区。四是科技创新网络化趋势越发明显。微软、谷歌、阿里巴巴、华为等许多全球性跨国公司的研发部门分散于世界各个地区，通过全球化研发合作网络实现更高效率的创新已经成为普遍趋势。

最后，全球城市化进入新的阶段。2008年世界城市化率超过50%，标志着人类已经进入城市社会（倪鹏飞等，2019），城市成为全球经济、科技、文化等各种经济社会活动的主要载体（倪鹏飞，2001）。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城市化中后期，再加上新型国际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城市之间的要素流动日益频繁，一个紧密联系的多层次全球城市网络正在逐步形成。

信息技术发展、全球化升级以及城市化进入新阶段，必将对世界城市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智能化、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新变化如何影响城市发展，特别是对全球城市会产生什么影响，全球城市的内涵是否会有新的变化，如何重新审视全球城市及其决定因素以及全球城市格局和全球城市体系会如何改变，就成为十分重要而迫切需要回答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 二、新型全球城市的理论假说

### （一）实践发展与理论演进

“全球城市”（Global City）这一概念最早由Cohen（1981）提出，Scott（2001）进一步提出“全球都市区”的概念。与之相似的“世界城市”（World City）概念则早在1889年就由德国学者Goethe提出。就内涵而言，全球城市更多的是就经济层面而言，而世界城市不仅包括经济层面的含义，还包括文化、政治等层面的含义。

#### 1. 第一次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理论发展（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

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是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时代（金碚，2016）。伴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扩张，商品贸易成为这次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形式。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世界城市的概念得以诞生。1889年，Goethe首次使用世界城市这一概念来描述当时的罗马和巴黎。1915年，Patrick Geddes明确提出世界城市这一概念，他认为世界城市就是“集中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商务活动的那些城市”。不过最早系统研究现代世界城市的学者是英国著名地理学家Hall，他对世界城市的概念做了比较全面的阐释，从贸易、金融、通信、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对世界城市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得出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七个城市位居世界城市体系顶端这一结论（Hall，1966）。

#### 2. 第二次全球化与全球城市理论形成（20世纪中叶至20世纪90年代）

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世界经济进入了稳定发展期，世界各国之间的经贸联系越来越密切。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商品、资本、技术等要素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流动，极大促进了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

国家大量转移，由此重构了全球生产体系，Fröbel等（1980）将其称为“新国际劳动分工”。这一时期的经济全球化以资本流和商品流为主导，也被称作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时期。在此背景下，西方学界围绕全球城市在世界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

Gottmann（1961）正式提出了“大都市带”（Megalopolis）的概念，认为脑力密集型产业是世界城市的重要标志。Hymer（1972）进一步将世界城市研究聚焦到经济领域，首次从跨国公司的角度来分析世界城市，认为跨国公司在日益密切的全球经济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采用拥有跨国公司总部数量的多少来判别世界城市。Cohen（1981）在世界城市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全球城市的概念，并将全球城市定义为“新的国际分工协调和控制中心”。Friedmann和Wolff（1982）也对世界城市的概念和特征进行了创新性的阐释，认为世界城市是全球资本的集聚地以及全球经济的控制中心。Friedmann（1986）认为世界城市具有控制和指挥全球经济的各种战略功能，组织协调着全球生产体系和市场体系，新国际劳动分工是形成世界城市的基本动力。该理论将城市化过程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以国际劳动分工的视角来研究世界城市，为世界城市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

Sassen（1991）则从企业区位选择的视角来研究全球城市，认为全球城市是组织和协调全球经济的中心城市，同时也是金融服务业等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和创新产业的主要集聚地，集聚优良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是一个城市具有全球控制能力进而形成全球城市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Sassen（1995）进一步提出了“生产服务综合体”的概念，认为全球城市为跨国公司的运作和管理提供生产性服务，从而成为跨国公司总部的集聚地。Simon（1995）也认为世界城市就是全球化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基点，判别世界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其是否具有一个完整的金融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体系，是不是全球资本流和信息流的汇集地。Beaverstock等（1999）又进一步从会计业、广告业、银行业、法律服务业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入手对全球城市进行了等级划分。

### 3. 第三次全球化与全球城市实践发展（20世纪90年代至今）

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的交通和通信技术深刻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和国际生产分工体系，经济全球化进程全面加速，对全球城市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经济全球化载体在商品流、资本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信息流，由此开启了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时代。在此背景下，从信息网络或信息流的角度来研究全球城市成为主流方向。这一时期，西方学界对全球城市的研究从静态空间扩大到流动空间，并基于信息时代的特征重新阐述了全球城市的内涵和形成机制。

Drennan（1992）发现全球性城市正在集聚越来越多的信息密集型公司总部。Lanvin（1993）认为信息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要素，先进通信设施的建设有助于推动全球城市的繁荣。Batten（1993）认为基于快速交通和高效通信网络基础上的更富竞争力的网络型城市将伴随信息化应运而生。Leyshon和Thrift（1997）也认为

远程通信网络和服务大大加强了要素的空间集聚,进而有力推动了全球城市的发展。Malecki (2001) 则发现全球网络信息的空间分布正在向全球城市集聚。Castells (1996) 从信息流动的视角研究了全球城市的发展,认为信息技术正在使得世界经济由“局部的空间”转变为“流的空间”,全球城市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地点,全球城市作为世界信息网络的主要节点,支配着互联网的全球地理结构。

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城市化已经进入新的阶段,但是,学术界对于近年来科技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发展对全球城市体系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改变全球城市内涵特征所产生的划时代影响缺乏足够的关注,相关理论发展已然滞后。因此,创新全球城市的相关理论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二) 理论框架与新型全球城市

### 1. 全球城市理论的新框架

综合上述实践发展和理论演进,可以发现,全球城市的本质是那些聚集当时全球最重要资源并向世界提供最最重要服务的城市或空间,需要具备如下特征:第一,全球城市在属性上具有唯一性;第二,全球城市在集聚关键资源方面具有唯一性;第三,全球城市具有联系全球的能力。由于在不同时代,当时最重要的资源要素和服务活动有所不同,全球城市的内涵就会有所变化,其范围也就可能发生改变。基于此,本文认为由于在不同的经济全球化阶段,主导的流动要素并不一致,伴随主导要素的变化,不同全球化阶段的全球城市内涵也不相同(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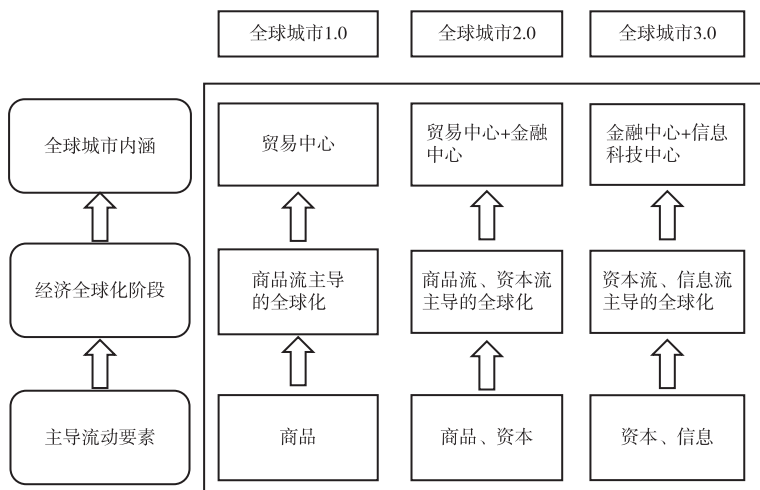


图2 全球城市理论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2. 新型全球城市的理论假说

全球城市是指能够影响和控制全球经济的中心城市。2016年,布鲁金斯学会和

摩根大通联合发布了《重新定义全球城市》的报告，他们认为随着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传统全球城市的概念已经被颠覆，需要重新定义全球城市的概念。倪鹏飞等（2018）也明确提出使用“新型全球城市”的概念来替代原来的“全球城市”概念。

从理论视角看，根据主导流动要素的不同，经济全球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商品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在商品全球化阶段，商品和资源贸易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各国城市之间的联系以商品流为主；在资本全球化阶段，资本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内容，资金流在各国城市之间的联系中占据主要地位；在信息全球化阶段，信息流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内容，信息流在各国城市之间的联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不同的全球化阶段，由于驱动全球经济的主导要素各不相同，全球城市的内涵以及具体全球城市均有所变化。在商品全球化阶段，全球经济主要由商品贸易驱动，资源型企业在这一阶段的全球化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Hall（1966）认为贸易中心应该是这一阶段世界城市的主要职能之一，并得出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七个城市位居世界城市体系顶端的结论。在资本全球化阶段，全球经济主要由资本驱动，金融企业成为这一阶段全球化的主导力量。Friedmann（1986）、Sassen（1991）、Simon（1995）均认为全球城市是全球资本集聚的节点城市，也是金融业等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和创新产业的主要集聚地。Sassen（1991）则进一步将纽约、伦敦、东京作为这一时期的全球城市。在信息全球化阶段，全球经济主要由信息技术来驱动，信息科技企业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全球城市的发展日益依赖先进的信息技术（Castells, 1991；Leyshon and Thrift, 1997；Malecki, 2001）。这一阶段，圣何塞、西雅图等城市作为信息科技中心快速崛起。

目前，人类社会正处于由资本全球化向信息全球化过渡阶段。一方面，金融资本的作用依旧不可小觑；另一方面，信息科技正在展现出惊人的威力，互联网的普及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互联网控制权成为未来全球城市竞争的制高点，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拥有整个世界（托夫勒，2006）。因此，信息科技和金融资本就成为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要素，也就成为决定新型全球城市内涵和未来全球城市竞争的关键因素。

### 3. 新型全球城市的特征

如表1所示，与传统全球城市相比，新型全球城市具有许多不同的特征。从主要功能来看，新型全球城市的核心特征是发挥全球金融中心和信息科技中心功能，而传统全球城市的主要功能则是金融中心功能，这也是两者的本质区别。从主导要素来看，新型全球城市影响全球经济的关键要素是资本和信息，而传统全球城市主要借助资本来影响世界经济。从人口结构来看，新型全球城市的人口结构相比于传统全球城市拥有更多的创意创新人口而不是创业创富阶层，这是因为新型全球城市主要从事创新和创意。从空间布局来看，相比于传统全球城市，新型全球城市的空间布局将更加偏向于网络化都市圈模式，这主要是因为相较于金融行业，信息科技企业具有远程办

公的条件，并且追求舒适宽敞的办公环境，这就使得新型全球城市的人口集聚程度将有所降低。从对外联系来看，新型全球城市更加强调城市之间的软联系（如远程交流等），而传统全球城市可能更偏重于城市之间的硬联系（如商务旅行等）。从基础设施来看，相较于传统全球城市，新型全球城市一方面要求具有更加发达完善的传统硬性基础设施，另一方面要求具有发达的新型软性基础设施（包括5G等信息基础设施）。从公共服务来看，相比传统全球城市，新型全球城市对公共服务设施的要求水平更高、范围更广。由于科技创新往往需要十分优质的宜居环境，因此，新型全球城市在提升传统公共服务的基础上，需要着重提升宜居环境。

表1 新型全球城市与传统全球城市的对比

| 领域   | 传统全球城市    | 新型全球城市         |
|------|-----------|----------------|
| 主要功能 | 金融中心      | 信息科技中心和金融中心    |
| 主导要素 | 资本        | 信息+资本          |
| 人口结构 | 创富阶层主导    | 创意阶层主导         |
| 空间布局 | 中心化       | 网络化都市圈         |
| 对外联系 | 偏向硬联系     | 偏向软联系          |
| 基础设施 | 发达的硬件基础设施 | 发达的软硬基础设施      |
| 公共服务 | 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 | 范围更广、水平更高的公共服务 |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 三、新型全球城市的测度

#### （一）新型全球城市的测度指标、数据和方法

##### 1. 测度指标

现有全球城市替代性测度指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通过单一替代性指标从某一核心维度来评价城市发展程度和划分城市层级具有简便易操作的优点。目前，关于全球城市的替代性单一测度指标有很多，主要从跨国公司、航空交通联系、经济控制能力等角度来设计。其中，基于跨国公司来设计全球城市的替代性测度指标较为流行。许多学者认为一个城市所拥有的跨国公司数量越多、层级越高，其管理与控制能力就越强，因而在全球城市等级体系中的地位也就越高（Hall, 1984; Taylor et al., 2002）。在具体指标设计方面，Cohen（1981）采用“跨国公司指数”“跨国银行指数”等替代性指标来衡量世界城市。英国拉夫堡大学全球化和世界城市（GaWC）研究小组则根据175家顶级生产性服务业跨国企业在全世界526个重要城市的分布情况来划分全球城市体系。上述指标主要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的跨国公司来进行评估分析，容易将新兴产业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行业排除在外，导致难以准确

评估新型全球城市。

相对而言，将全球知名品牌分布作为衡量新型全球城市的替代性测度指标更具优势。企业品牌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逐步形成的一种价值契约，是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最重要体现。全球知名品牌反映了该企业乃至该行业对全球经济的巨大影响力，是一个时期内全球经济主导力量的外在显现。因此，知名品牌企业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就能相对准确地反映出一个时期不同城市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及其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即一个城市所拥有的全球知名品牌越多，其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也就越高。基于此，本文使用全球知名品牌在全球不同城市中的分布来划分新型全球城市体系。

## 2. 测度数据及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 Brand Finance 发布的 2020 年度分行业最具价值品牌榜单，具体包括 2020 年度全球最具价值的 100 个信息科技品牌、100 个金融服务品牌以及 50 个商务服务品牌。<sup>①</sup> 本文在确定每个品牌所属公司总部所在地的基础上，以 2020 年有品牌入选上述榜单的城市作为样本城市，最终选取了全球 79 个城市作为样本城市进行全球城市测度和评价。

本文主要采取指标合成法来综合评价 79 个样本城市并确定新型全球城市名单。首先，根据 2020 年各样本城市所拥有的信息科技品牌数量、金融服务品牌数量和商务服务品牌数量对样本城市分别进行标准化计算；其次，对上述三个标准化值按照 4:4:2 的比例进行加权平均并做标准化计算，得出综合得分；最后，根据该综合得分进行排名并选取前 55 位城市进入新型全球城市候选名单。

### （二）新型全球城市的测度结果

本文根据综合得分情况将前 55 位城市分为 4 个层级：第一层级为顶尖新型全球城市，第二层级为重要新型全球城市，第三层级为次要新型全球城市，第四层级为潜在新型全球城市（见表 2）。<sup>②</sup> 顶尖新型全球城市共有 4 个，分别是纽约、北京、伦敦、圣何塞，这些城市拥有发达的金融实力和信息科技实力，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发挥着全球性金融中心功能和信息科技中心功能。重要新型全球城市共有 13 个，分别是东京、旧金山、苏黎世、深圳、多伦多、巴黎、芝加哥、首尔、杭州、阿姆斯特丹、上海、华盛顿、波士顿，这些城市具有较为发达的金融实力和信息科技实力，在较大范围内发挥着金融中心功能和信息科技中心功能。次要新型全球城市共有 16 个，包

<sup>①</sup> 考虑到少数品牌虽然价值很高，但只是在本土范围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尚未体现其全球影响力，因此，本文根据是否服务本土之外市场的原则，剔除了少数只具有局部知名度的品牌。另外，100 个金融服务品牌包括全球最具价值的 40 个银行品牌、10 个证券交易所品牌以及 50 个保险品牌。

<sup>②</sup> 本文首先将综合得分排名前 55 位的城市列入新型全球城市候选名单，然后将 0.05、0.15、0.60 作为综合得分断点来划分不同层级新型全球城市，综合得分在 0.60 及以上的属于顶尖新型全球城市，综合得分在 0.15 ~ 0.60 的属于重要新型全球城市，综合得分在 0.05 ~ 0.15 的属于次要新型全球城市，综合得分在 0.05 以下的属于潜在新型全球城市。



括西雅图、香港、新加坡、洛杉矶等城市，这些城市具有相对较强的金融实力和信息技术实力，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着金融中心功能和信息技术中心功能。潜在新型全球城市共有 22 个，这些城市具有一定的金融实力和信息技术实力，或某一方面比较突出但另一方面相对欠缺，在未来很有可能成为新型全球城市。

表 2 新型全球城市分级及与 GaWC 世界一线城市分类的对照

| 新型全球城市   |   | GaWC 世界一线城市 |  |
|----------|---|-------------|--|
| 层级       | 城市  | 层级          | 城市   |
| 顶尖新型全球城市 | 纽约、北京、伦敦、圣何塞  | Alpha + +   | 伦敦、纽约  |
| 重要新型全球城市 | 东京、旧金山、苏黎世、深圳、多伦多、巴黎、芝加哥、首尔、杭州、阿姆斯特丹、上海、华盛顿、波士顿   | Alpha +     | 香港、新加坡、上海、北京、迪拜、巴黎、东京  |
| 次要新型全球城市 | 西雅图、香港、慕尼黑、大阪、京都、马德里、都柏林、新加坡、台北、明尼阿波利斯、蒙特利尔、孟买、班加罗尔、洛杉矶、斯德哥尔摩、亚特兰大                          | Alpha       | 悉尼、洛杉矶、多伦多、孟买、阿姆斯特丹、米兰、法兰克福、墨西哥城、圣保罗、芝加哥、吉隆坡、马德里、莫斯科、雅加达、布鲁塞尔  |
| 潜在新型全球城市 | 密尔沃基、费城、休斯敦、迈阿密、巴尔巴鄂、伯明翰、博洛尼亚、夏洛特、哥伦布、杜塞尔多夫、爱丁堡、法兰克福、福州、海牙、汉诺威、哈特福德、兰辛、莫斯科、匹兹堡、罗马、的里雅斯特、温尼伯 | Alpha -     | 华沙、首尔、约翰内斯堡、苏黎世、墨尔本、伊斯坦布尔、曼谷、斯德哥尔摩、维也纳、广州、都柏林、台北、布宜诺斯艾利斯、旧金山、卢森堡、蒙特利尔、慕尼黑、德里、圣迭戈、波士顿、马尼拉、深圳、利雅得、里斯本、布拉格、班加罗尔 |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全球城市竞争力数据库和 GaWC 世界城市名册。

与 GaWC 在 2020 年发布的世界一线城市名单相比，新型全球城市分级主要呈现如下特点。第一，许多信息科技中心城市跻身主要全球城市行列。比如，作为硅谷所在地的圣何塞和旧金山分别跻身第一层级的顶尖新型全球城市和第二层级的重要新型全球城市行列，而在 GaWC 发布的世界一线城市名单中，圣何塞尚未进入世界一线城市行列，而旧金山也只是处于第四层级（Alpha -）。第二，北京、深圳等中国城市在新型全球城市中的排名更加靠前。比如，北京跻身第一层级的顶尖新型全球城市行列，深圳、杭州则分别跻身第二层级的重要新型全球城市行列，而在世界一线城市名单中，北京处于第二层级（Alpha +），深圳处于第四层级（Alpha -），杭州则尚未进入世界一线城市行列。第三，过于偏重金融中心功能而在信息科技中心功能方面相对欠缺的城市排名有所下降。比如，迪拜在世界一线城市名单中处于第二层级（Alpha +），但是未能进入新型全球城市行列；同样，作为传统金融中心的香港虽然在世界一线城市名单中处于第二层级（Alpha +），但是在新型全球城市分级排名中仅位于第三层级的次要新型全球城市行列。

## 四、新型全球城市形成的路径与原因

### （一）新型全球城市的形成路径

#### 1. 传统全球城市叠加信息科技中心功能实现转型

传统以金融中心为核心功能的全球城市正加速发展信息科技产业进而向信息科技中心转型，最终发展成为新型全球城市。以纽约和伦敦为例，纽约、伦敦等传统全球城市过去凭借强大的金融服务能力在全球城市体系傲视群雄，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但是，随着信息科技对全球经济的作用日益凸显，信息科技中心城市的地位不断上升，而传统金融中心城市的地位则相对衰落。为维持全球顶尖城市地位，纽约、伦敦不断提升以信息科技为代表的科技创新能力，积极向信息科技中心转型。2009—2013年，纽约高科技行业的就业数量增长了33%，远高于8%的所有行业平均水平。截至2016年，纽约市科技行业创造的就业数量已经超过了金融业，纽约也因此获得了“硅巷”（Silicon Alley）的美誉。作为另一个全球金融中心，伦敦的信息科技产业也在蓬勃发展。2010年，伦敦提出打造“东部硅谷”的设想，经过五年时间，已经聚集了英特尔、谷歌、脸谱等众多科技巨头，同时诞生了4000多家科技创业企业。目前，伦敦已经成为欧洲最大的科技创业中心。

#### 2. 全球信息科技中心叠加金融中心功能实现转型

随着信息科技中心城市地位的不不断提升，金融要素也正在加速向其集聚，助推其成为新型全球城市。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旧金山、圣何塞等新兴科技城市。圣何塞和旧金山作为美国乃至世界的信息科技中心，聚集了谷歌、脸谱、苹果、英特尔、思科、甲骨文等一大批世界顶级信息科技企业。它们不仅具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还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成熟和最具竞争力的风险资本市场，集聚了大量的风险投资基金。2017年，硅谷的风险投资已经占到加利福尼亚州的78.3%和全美国的38.9%。同时，硅谷还具有较强的银行市场，硅谷银行模式不同于传统商业银行模式，其专注于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与风险投资紧密合作，为不同阶段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随着金融资源的不断集聚，旧金山、圣何塞等城市的金融中心功能也在不断增强，由此进一步提升了其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话语权。

#### 3. 新兴经济体中心城市直接升级为新型全球城市

新兴经济体的中心城市通过发展信息科技中心功能和金融中心功能，进而升级为新型全球城市。例如，中国的北京、上海和深圳。一方面，北京、上海、深圳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城市。根据2019年英国智库Z/Yen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的第25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 25），北京、上海、深圳跻身前15。其中，上海和北京分别排名第5位和第9位，成为全球十大金融中心之一。另一方面，北京、上海、深圳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方面也发展迅猛。根据全球知名市场数据平台CB Insights 2018年发布的《全球科技中心报告》，北京和上海被列

为高速成长中的科技中心，跻身全球二十大科技中心城市，深圳则被列为全球科技中心的高潜力城市。随着北京、上海、深圳等新兴经济体中心城市逐步冲击全球金融中心和信息科技中心，新型全球城市的格局也将迎来重大变化。

## （二）新型全球城市的形成原因

### 1. 金融依然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支配性力量

与信息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不同，金融行业发展相对缓慢，但依旧是支配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根据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总计有113家金融公司入选，占总数的22.6%，与2007年（115家）相比略有下降。在最赚钱的50家公司排行榜中，2019年全球共计有13家金融公司入选，占总数的26%，与2007年（22家）相比减少了9家。但是，2019年有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摩根大通、中国农业银行、美国银行、中国银行等6家金融公司位列前十大最赚钱公司，而2007年只有花旗集团、美国银行位列其中。上述事实一定程度上证明，虽然金融行业对经济的影响力相对有所下降，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依旧是全球经济的支配性力量。

### 2. 信息科技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从现实视角看，信息科技产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正在不断增强，未来可能与金融产业一起成为主导全球城市地位的核心因素。信息科技的崛起是深刻改变21世纪全球经济的标志性事件，信息流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流动要素，而与信息流密切相关的信息科技产业正在成为控制全球经济的新制高点。通过对比由Brand Finance发布的2008年和2020年世界品牌TOP20榜单（见表3），可以清晰发现，信息科技企业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崛起。2008年，对人类社会最有影响力的品牌基本上是食品、手机、汽车等消费类品牌和银行等金融类品牌。但是到了2020年，前十位中有7个品牌属于信息科技行业，其中，排名前三的亚马逊、谷歌、苹果更是世界著名信息科技企业。这充分反映了信息科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全球经济，进而影响全球城市格局。

表3 2008年和2020年全球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前20名

| 排名 | 2008年    |      | 2020年  |     |
|----|----------|------|--------|-----|
|    | 品牌       | 城市   | 品牌     | 城市  |
| 1  | 可口可乐     | 亚特兰大 | 亚马逊    | 西雅图 |
| 2  | 微软       | 西雅图  | 谷歌     | 圣何塞 |
| 3  | 谷歌       | 圣何塞  | 苹果     | 圣何塞 |
| 4  | 沃尔玛      | 本顿维尔 | 微软     | 西雅图 |
| 5  |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 纽约   | 三星     | 首尔  |
| 6  | 通用电气     | 波士顿  | 中国工商银行 | 北京  |

续表

| 排名 | 2008 年   |      | 2020 年   |      |
|----|----------|------|----------|------|
|    | 品牌       | 城市   | 品牌       | 城市   |
| 7  | 汇丰银行     | 伦敦   | 脸谱       | 圣何塞  |
| 8  | 惠普       | 圣何塞  | 沃尔玛      | 本顿维尔 |
| 9  | 诺基亚      | 赫尔辛基 | 平安       | 深圳   |
| 10 | 花旗集团     | 纽约   | 华为       | 深圳   |
| 11 | 沃达丰      | 伦敦   | 奔驰       | 斯图加特 |
| 12 | 丰田       | 名古屋  | 威瑞森      | 纽约   |
| 13 | 欧莱雅      | 巴黎   | 中国建设银行   | 北京   |
| 14 | 英特尔      | 圣何塞  |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 达拉斯  |
| 15 | 美国银行     | 夏洛特  | 丰田       | 名古屋  |
| 16 | 百事       | 纽约   | 国家电网     | 北京   |
| 17 | 戴尔       | 奥斯汀  | 迪士尼      | 奥兰多  |
| 18 |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 达拉斯  | 中国农业银行   | 北京   |
| 19 | 威瑞森      | 纽约   | 微信       | 深圳   |
| 20 | 万宝路      | 里士满  | 中国银行     | 北京   |

资料来源：<http://brandirectory.com>。

### 3. 金融中心功能与信息科技中心功能有机融合推动形成新型全球城市

金融中心功能与信息科技中心功能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有机融合共同铸就形成新型全球城市的主要动力。首先，金融中心功能的提升有助于推动信息科技中心功能的发展。信息科技作为典型的创新行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而完善的金融市场有助于信息科技企业在各个发展阶段获得便捷的融资。因此，金融中心功能的发展有助于促进信息科技中心功能的提升。其次，信息科技中心功能的提升反过来可以赋能金融中心功能发展。信息是进行金融定价、构建金融体系的基础，而信息科技企业掌握着巨大的数据资源，拥有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可以有效降低金融业的信息获取成本，从而推动金融业的发展。因此，信息科技中心功能的提升也可以促进金融中心功能的发展。最后，高端商务服务业有助于两者的融合发展。高端商务服务业作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领域，对金融业和信息科技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服务保障作用，推动了金融中心功能和信息科技中心功能的有机融合。

总之，随着信息科技在全球经济中的快速崛起，信息科技企业在全球的分布必将大大改变全球城市体系的格局，信息科技企业集聚的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话语权将大大提升，信息科技产业将与金融产业一起成为决定城市全球地位的关键因素，未来的全球城市将是那些在金融产业和信息科技产业均处于领先地位并能实现相互赋能的城市。传统全球城市的概念将被颠覆，新型全球城市将崛起。新型全球城市的“新”主要体现在信息科技中心功能和金融中心功能的有机叠加，信息科技

和金融的结合将使得全球城市功能体系更加完善，能够更好发挥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由资本全球化向信息全球化过渡阶段，一方面，金融依然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支配性力量；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本文根据全球经济主导要素决定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阶段，进而决定全球城市内涵和特征这一理论框架，得出如下结论：信息技术和金融资本已经成为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关键因素，传统全球城市的概念将被颠覆，新型全球城市正在崛起，新型全球城市的核心特征就是信息技术中心功能和金融中心功能的有机叠加，这也是其与传统全球城市的本质区别。

新型全球城市的崛起必将冲击旧有的全球城市体系。就传统全球城市而言，如果在经济全球化3.0时代不能紧跟时代趋势，牢牢占领信息技术制高点，就有可能被后来者赶超，甚至失去全球城市的地位；就新兴城市而言，如果能抓住这一机遇，就有可能实现“换道超车”，跻身全球城市行列。当前，对于有志成为全球城市的中国城市来说，应重点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一是强化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要建立多层次、网络化、畅连接的立体式对外交通网络，打造全球航空枢纽、海运枢纽以及陆路交通枢纽；另一方面要构建完善的城市内部一体化交通网络。二是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加快建设5G网络、城市大脑等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提供坚实保障。三是提升公共服务水平，重点加强教育、医疗、生态环境等领域的投入，支持鼓励不同市场主体加强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化、便捷化。

第二，加快金融改革开放，强化金融服务能力。一是提升金融开放水平，扩大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加速集聚全球各类金融机构，打造金融机构总部集聚地，建立健全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二是加快金融创新步伐，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服务创新，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金融产品；全速推进金融科技创新，加大关键技术研发，提升金融科技应用水平，促进金融科技企业集聚。三是健全金融市场体系，提升金融基础设施水平，构建一个包含股票、债券、外汇、期货、保险等市场的完整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和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机制，确保金融市场总体稳定。

第三，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打造创新文化氛围。一是提升基础研究能力，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等领域，布局建设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二是吸引国内外顶尖人才，全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引育环境，去除人才流动障碍，形成人才自由流动氛围，建立健全与科技创新相匹配的人才培养、引进、

使用、评价、激励、流动机制。三是营造开放创新的社会环境，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积极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社会氛围，推动创新文化和创新精神融入城市内核。

## 参考文献

- [美] 阿尔文·托夫勒 (2006): 《权力的转移》, 吴迎春、傅凌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 金碚 (2016): 《论经济全球化 3.0 时代——兼论“一带一路”的互通观念》, 《中国工业经济》第 1 期, 第 5~20 页。
- 倪鹏飞 (2001): 《中国城市竞争力的分析范式和概念框架》, 《经济学动态》第 6 期, 第 14~18 页。
- 倪鹏飞、马尔科·卡米亚、王海波等 (2018): 《房价: 改变城市世界》,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倪鹏飞、徐海东、沈立等 (2019): 《城市经济竞争力: 关键因素与作用机制——基于亚洲 566 个城市的结构方程分析》,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 1 期, 第 50~59 页。
- 沈立、王海波、刘笑男 (2018): 《中国城市崛起与城市经济学新发展——首届中国城市经济学者论坛综述》, 《经济研究》第 7 期, 第 203~207 页。
- Batten, D. F. (1993), *Network Cities Versus Central Place Cities: Building a Cosmocreptive Constellation*, Heidelberg: Springer.
- Beaverstock, J. V., P. J. Taylor and R. G. Smith (1999), “A Roster of World Cities”, *Cities*, 16 (6), pp. 445–458.
- Castells, M. (1991), *The Informational City: A New Framework for Social Change*, Centre for Urban and Community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 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 Cohen, R. B. (1981),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New York: Taylor and Francis.
- Drennan, M. P. (1992), “Gateway Cities: The Metropolitan Sources of US Producer Service Exports”, *Urban Studies*, 29 (2), pp. 217–235.
- Friedmann, J. (1986),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7 (1), pp. 69–83.
- Friedmann, J. and G. Wolff (1982), “World City Formation: An Agenda for Research and A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6 (3), pp. 309–344.
- Fröbel, F., J. Heinrichs and O. Kreye (1980),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in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 and Industrialis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ttmann, J. (1961), *Megalopolis: The Urbanized Northeastern Seaboard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 Hall, P. G. (1966), *The World Citie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 Hall, P. G. (1984), *The World Citie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td.
- Hymer, S. (1972),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the Law of Uneven Development”, in J. N. Bhagwati (ed.), *Economics and World Order from the 1970s to the 1990s*, New York: Collier-Macmillan,

pp. 113 – 140.

Lanvin, B. (1993), *Trading in a New World Order: The Impact of Telecommunications and Data Service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Leyshon, A. and N. Thrift (1997), “Spatial Financial Flows and the Growth of the Modern City”,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49 (151), pp. 41 – 53.

Malecki, E. J. (2001), “The Internet Age: Not the End of Geography”, in Felsenstein, D. and M. Taylor (eds.), *Promoting Local Growth: Process, Practice and Policy*, Aldershot: Ashgate, pp. 227 – 253.

Sassen, S. (199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assen, S. (1995), “On Concentration and Centrality in the Global City”, in Knox, P. L. and P. J. Taylor (eds.), *World Cities in a World Syst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63 – 75.

Scott, A. (2001), *Global City-Regions: Trends, Theory,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mon, D. (1995),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Reflections from the Periphe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P. J., G. Catalano and D. R. F. Walker (2002),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the World City Network”, *Urban Studies*, 39 (13), pp. 2377 – 2394.

## New Global City Hypothesi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 Facts

NI Peng-fei<sup>1</sup> SHEN Li<sup>2</sup>

(1. 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8, China;

2. Department of Economic Forecasting, State Information Center, Beijing 10004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connotation of different stages of globaliz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development of global city, extracts a more gener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global city, and then puts forward a new hypothesis of global city based on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logic. From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the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ew global city are analyzed and it is evaluated from the new perspectiv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finance are becoming the leading forc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organic superposition of the function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enters and financial centers has become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global city. New global citie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levels, in which New York, Beijing, London and San Jose are the top new global cities.

**Key Words:** new global cit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financial cen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enter

责任编辑: 庄立